

“习总书记既抓大事，又重细节”

——习近平在正定



采访对象：刘成君，1950年生。1984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2010年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邛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7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刘成君家中

采访组：刘成君同志，您好！您1984年调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请您讲讲当时主要的工作内容。

刘成君：1984年，我调到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当干事、资料员。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内容，还有就是写给地委的简报、信息等。习总书记经常给我们资料组的人员讲材料。

我们工作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起草一个习总书记在干部会上的讲话，习总书记就跟我们一起聊，把他的思想、思路谈一谈，几个要点都谈得清清楚楚，我们用笔记本记录下来，这叫“讲材料”。接下来，我们“趁热”就把领导谈的内容进行消化，第一时间写出稿子来，这叫“写材料”。之后再由资料组组长和办公室主任，同习总书记在一块梳理和研究稿子的内容，进行增删和修改，这叫“改材料”。经过这三个阶段，一份讲话才算是完成。习总书记在开干部会的时候，就以这个稿子为基础来讲话。当然，实际讲话的时候，习总书记几乎都要随时脱稿，进行很多补充和发挥。

采访组：大家都说习近平同志是个亲

切、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刘成君：习总书记确实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干部。那个时候人手不够，资料任务多，工作很忙，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当时都在机关住，白天一堆日常事务，全靠晚上加班写材料。我和张银耀一个办公室，就在习总书记隔壁。习总书记和大家一样也是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

每天，习总书记都在食堂和大伙一样排队吃饭。吃完晚饭，习总书记就到办公室去看看电视新闻。看完新闻，他有时候就直接回办公室加班了，有时候也会叫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

我们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习总书记对待我们像兄弟、朋友一样。早上我们谁起得早，谁就叫其他人起来，有时候我起得早，就把隔壁门一敲：“习总书记，走！咱们锻炼去！”有时候他起得早，就来敲我的门：“成君，咱们散步去！”我们散步之后，一起回来吃饭、上班。

习总书记这个人很平易近人。我刚到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爱人去县委找

我，她在楼道里碰见习总书记，她当时不认识他，就向他打听我在哪个办公室。习总书记说了我在哪间屋，看我爱人还有点含含糊糊，干脆就一直带着她到我办公室来了。习总书记走了之后，我跟我爱人说：“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咱们的县委书记。”

我爱人大吃一惊，她说：“哎呀嗨！真不知道，他还亲自带我过来。”

采访组：据您的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工作中都有哪些特点？

刘成君：习总书记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随时发现问题。习总书记经常带着资料室主任王志敏和其他一些同志下去调研，我也跟他去调研过。有一次，我陪他去西南街，他和基层干部开座谈会，座谈如何让老百姓致富、如何发展、如何改变面貌，我就跟着他记录一些情况。

下面的干部都喜欢听习总书记讲话。他讲话干脆利落，要讲的内容特别明确，而且讲得很实，让人听着不枯燥。他的讲话，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让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坦率地说，长期以来，正

定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习总书记是从中央来的，他站得高，看得远，知道的东西多，眼界宽，见识广。他开启了正定解放思想的大门，促进了正定干部的思想转变，由此推动了正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他在正定3年多时间，对正定的改变和提升是很显著的。

那时候，县委有个《正定快报》，就是他提议办的。刊物不定期，有了内容就发，有时候一天发一期，有时候几天发一期。报纸主要刊登全县的大事、领导活动、新的动态等，让全县人民能随时了解正定的情况。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都有这个报纸，每个领导也都有一份。

报纸这种媒体，后来承载了很多娱乐的功能，但在过去，它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工具，而且是与时事、要闻、最新政策连接最紧密的一种学习工具。

有一次，习总书记正在屋里看报纸，有位普通工作人员从他门口过，跟他打个招呼，说：“习总书记，你没事了？”习总书记笑笑说：“我学习呢，这是很重要的事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推动修缮大佛寺、兴建荣国府等工作，请问您是否还了解他当年在正定为保护文物古迹和振兴文化事业所做的其他一些工作？

刘成君：有的。在习总书记倡导下，我们兴建了常山影剧院。正定县原来只有电影院，没有影剧院，常山影剧院是我们第一个县级影剧院。剧院的名字还是习总书记找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林默涵给题的字。影剧院的设施很好，功能很齐全，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唱戏，还可以开大会。有了常山影剧院之后，我们经常请外地的剧团来唱戏，丰富正定人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传播传统艺术尽一点力。

习总书记干工作，大事要抓，细节也要抓，宏观上有大的谋略，微观上也很注意细节。

有一次，习总书记和我一起散步，发现了一块石碑，外面有个栅栏拦着，但是因为栅栏缝隙比较大，小孩都能钻过去玩。

（上接1版二条）

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新论断，他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问题。9月17日下午，他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时明确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他说：“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这实际上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抓纲治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主题。

“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保持着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设计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并且带有用数字来“算账”的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的1000美元，翻两番。这个目标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材料作出的科学判断。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算算账”，调查一下实际可能性。

1980年六七月间，邓小平专门到几个省做了一次调查研究。7月22日，他在赴郑州的途中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

想描绘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蓝图。

这个“小康水平”是个啥样子？具体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实现？带着这个问题，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再次进行调查研究。

1983年2月6日，邓小平抵达苏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宾馆开门见山地向江苏省负责同志了解：“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

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近年来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实现“翻两番”。

邓小平急切地想知道，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邓小平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之后，邓小平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调研。这次江、浙、沪三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和6条标准，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之后，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70年的发展蓝图。1986年9月，他在会见一位外宾时幽默地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摆脱贫困，实现一个小康的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不太富裕，但是日子好过。至于下一个世纪，那不是我的事了，我采取不介入态度，总不可能活到100岁嘛。但是，我们现在有权制定一个战略目标。到下个世纪，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个时候，才能说我们这个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实现我们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做了准备，创造了条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部署。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这可以说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调查研究，他谆谆教诲各级干部：“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编审）

（上接1版头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

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实践中，往往会遇到如下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经济学要研究资源配置，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怎样研究资源配置？

王东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资源配置，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却与西方经济学明显不同。西方经济学中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原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原理、帕累托最优状态等皆侧重于技术层面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角度研究。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讲就是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他指出：“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

他特别提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在阐述“坚持新发展理念”时讲的。习近平总书记为何要在这部分讲？因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涉及资源配置的方式改革与调整，而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说，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其实是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总依据，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确定了基本范式。

王东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思想，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

的机制，与社会制度无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第二，市场并非万能，在有些领域市场可能失灵。正由于市场会失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市场的一般规律，也要研究市场失灵，特别是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市场失灵。比如收入差距拉大是市场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一旦出现了两极分化则是严重的市场失灵。

第三，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管理经济也可能失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并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了中国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什么的定位？

王东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也进入发展新常态。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要将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为中高端；动力要从投资、出口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怎样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国方案，也是为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其核心要义是，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应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要通过改革推动结构调整。近期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而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供给结构不断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体制机制。

王东京认为，毋庸讳言，过去30年政府管理经济的着力点主要在需求侧。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内需。可是今天情况变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生产体系与需求结构不匹配。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需求外溢较为严重，企业效益下降。面对这些问题，仅扩大内需虽能实现总量平衡，但却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问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要变。

王东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综合研判全球经济大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结构性问题也具有借鉴价值。